

追梦世纪

——本刊独家专访《我们的留学生活》制作人张丽玲



张丽玲的双眼总透着一股执著。

《燃情岁月》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人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和呼唤去做事的。”这句话用来描写张丽玲正好合适。

张丽玲,32岁,杭州人,现在任大富商社社长。16岁时离家到北京做影视演员;21岁赴日本留学。1995年舞台导演专业硕士毕业,同时进入大仓商社工作。

1995年12月她自己开始筹拍纪录片,1996年3月正式开拍,1999年6月结束。三年多的时间里接触了300多人,跟踪拍摄66人,共拍了1000多盘素材带。张丽玲的行为在这三年多的“燃情岁月”中被称为痴狂。

从她1989年踏进东京成田机场时,她内心的声音就在呼唤。双眼茫然的女孩、四处张望的小伙子,拖着八九个巨大行李箱的中年男子……异国他乡的机场里挤满了留学的同胞。

1996年3月《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开拍,张丽玲兢兢业业的工作后,业余时间就和摄像机一块儿跟着一个个故事转。当时她对拍片就像吸毒一样上瘾。有人说她疯了,有人说她变态,但所有的她都听不进去。她说,自己是一个一旦认定要做就绝不退缩的人。

结果她成功了,她和她的纪录片感动了所有的人,从日本到中国。《我们的留学生活》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张丽玲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她把活生生的现实搬进了另一个形象世界,她完成了自己的梦。

她说:“所谓的幸福,其实就是对一件事的巨大投入。”

她说自己是一个追梦的女人。



美丽的张丽玲有一颗美丽的心。她说只有自己是一个美丽的人,才能去发现和挖掘别人的美丽。

我愿意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人有了梦想和追求,会变得丰满而美丽。我欣赏为理想而奔波的人。

人在奋斗中能更多地体味生命的意义和魅力。必须有切身的感受才会有升华。只有返璞归真才可能有永恒。

无论是否有梦、还是在追梦,都不应该

忘记去追求善良和美好的未来,因为梦是和美好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让自己首先成为有品德的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我们更应该保持纯朴、爱心和高尚。

——张丽玲
2001年1月18日

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人们会有许多层次的情绪,失落也好,迷惘也好,幸福也好,快乐也好,每个人也许会问自己:三十世纪,我们为之努力过的,如今都实现了吗?不管是财富还是精神,不管是绿色家园还是美丽生活,我们为它寻找过,如今都得到了吗?那些友情和爱情,那些荣誉与梦想,也许进入了这个物质时代,许多人不再有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也许人们觉得梦想高高挂在月亮上,那么遥不可及,模糊不清。二十一世纪,我们还有梦吗?在年夜饭的饭桌上,有团圆的和不团圆的。那些不团圆的家庭也许正思念着大洋彼岸的亲人。那些留洋在外的学子,那些追梦的人们是否会在三十晚上想起故乡的云。我想起有一部拍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生活的纪录片。我记得里面有一张张美丽的脸和充满希望的眼睛。当钟声敲到十二下,我在思考,也许,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梦世纪。

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为我的版面定下了一个主题“追梦”,为了这个主题,我要寻找一个追梦的人。我拨通了为此轰轰烈烈走过一次的张丽玲的电话,十分幸运。近期她回国探望妹妹张丽焯的病情。北京时间12月18日下午3:30,我在京广中心咖啡厅约见了她。

别来无恙,张丽玲?

张丽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透明的眼镜背后,还是那双炯炯有神,能将一切看透的大眼睛。她说工作忙得已经让她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她在日本工作从来是没有周末的,甚至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父母都习惯了她的生活,如果过年过节,张丽玲能和家人一起团圆在饭桌上,那大家都会觉得赚了。

如今身为大富商社社长的她不仅要维持频道的正常运作,还忙于把《我们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日子》翻译成日文。片子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要进行重新剪辑。她手下有一批工作人员正为此没日没夜的工作。经常半夜3、4点打电话:“张丽玲,你来看一下!”张丽玲说:“现在啊?几点?怎么过去?”同事们都说:“哟,你还有时间观念啊?我们都是被你传染的。你快回来吧!”

不过,辛苦的工作是有回报的。片子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比在北京的反响还大。

日本一家一向不说中国好话的报纸《产经新闻》,在最后的彩页上刊印了中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并列的图像,并在下面注明:《留》一片将告诉你勇气和力量……张丽玲把不可思议的事变成了现实。

原来感动是可以跨越国界的。张丽玲说:“所谓的幸福就是对一件事的巨大投入。”

敬爱的同胞

张丽玲说:“留学生中很多是平凡人,但我总是被他们的某种精神和生存方式所感动。那些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改善生活也好,赚钱也好,求学深造也好。他们就为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甘愿地付出那么多代价,他们实在太可敬了。”

张丽玲一度想用文字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感动,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因为她觉得回过头去看文字,给她的感觉远不如生活中真实画面所带来的那种振奋和激动。

读语言学校、考大学、读硕士、同时打工。留学生的生活,别人经历的张丽玲也经历了。她就是纪录片其中的一个元素,也许正因为这个,《留》才取得巨大成功。许多人甚至说,中日建交这么多年,这部片子真正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许多日本人,因此而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人。

一位留日的中国大学生给张丽

玲写来感谢信。原来他从不参加班里的研修课和自习课,正课一完就赶着时间去打工。教授觉得他是一个不用功的人,留什么学啊,课一完就走。在学校,教授从不和他说话,只用斜眼看他。他非常痛苦,可又不能半途荒废学业,所以只有在教授歧视的眼光中每天奔波于课堂和工作之间。

有一天,他接到了教授夜里拨来的电话。一句“加油啊!”让他热泪盈眶。《留》胜过了无数言语解释。

在日本创业的中国人借了保人的钱,每天总是生活在催账的紧张中。《留》一片在日本播出后,他的保人说:“你的钱不用还了,在你有生之年,什么时候有能力还我再还!”

在日本公司的许多中国员工经常耳闻许多这样的言语:“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儿干一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在你们那儿干一年,真划算!”《留》一片播出后,中国员工再来到日本公司,同事们都热情地说:“原来你们也是这么有信念的人,也是这么奋斗过来的啊!”他们一个个翘起了大拇指说:“这真了不起!”

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人写信给张丽玲,他们共同的称谓只有一个——“敬爱的同胞”。

张丽玲说,人活在世上总要去做什么,去创造意义,总要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梦想。

小时候是老大

在我的印象中,张丽玲是一个坚强而有魄力的人。好像有一种力量一直支撑她执著地追求到底。

在拍摄《留》一片中,有一次她去了东京的一个海鲜集散市场——筑地。在日本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夏天去了筑地拍摄,那一天就不能再到别处去了。因为筑地环境非常差,垃圾遍地,味道难闻,再加上天气奇热无比,一走进去就让人恶心。

那次正值酷暑,张丽玲和她的摄制组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机,凌晨4点开始摆开架势拍,温度很快往上涨,张丽玲和伙伴们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阵阵恶心也往喉头涌。一连坚持了8个小时,终于收工了。几个年轻的日本人脱下衣服拧着汗水,说到:“总算完了,快脱水了,赶紧回家洗澡吧!”

而那天的平均温度是41度,他们共喝了68瓶矿泉水。

张丽玲说:“对不起,不能回家,已经联系好了别人,不能不去。现在必须马上赶过去。”摄像师火了,叫道:“你有没有常识,你疯了吗?我不干了。”张丽玲也非常愧疚,说:“那行,你们回去休息吧,摄像机借给我。我不能对别人失信。”日本人无言以对,这个小女子的态度如此坚

决,让人无法拒绝。他们又跟着张丽玲踏上了拍摄之路。下午连着又拍了两个人,工作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现在播出的十集片子里却只用了那天拍的两个镜头。

现在张丽玲和他们都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回想起以前,盟友们都表示为人生中这唯一一次巨大的投入与没有商业利益的合作感到荣耀。

张丽玲说拼命三郎似的性格大概是从小养成的。小时候张丽玲像个老大人,她不爱说话,不和同龄的孩子一块儿玩。她的时间用来一个人独自思考。我想,正是这种思考让张丽玲挖掘出了留日学生生活的闪光点。让她和他们直接进行了一场纯粹的生命对话和情感沟通。

我要做一个追梦人

小时候,每个人都有闪闪发光的梦想,可是它会被一天天流逝的岁月和现实磨得黯然无光。当你听见一个小女孩说:“我要当花店的老板娘。”当你听见一个小男孩说:“长大了我要开一家面包店!”你会觉得他们特别可爱。其实,这就是梦想,不需要多大,也不需要多辉煌。

张丽玲说,理想和欲望是有绝对区别的。同样一个目标,如果是欲望,那达成了也不快乐;如果它是一个梦想,即使你终生努力、即使绕了许多弯路才走上正轨,这中间的过程也会令你非常快乐。张丽玲说,如果说《留》一片有意义,那么它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予别人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决心。

一次,张丽玲和妹妹一起去商场。一位顾客认出她,抓住她的手连声道谢。原来她的女儿自从看了《留》一片后,像是突然长大了,变得特别懂事,学习特别用功。她告诉妈妈,自己要做一个追梦的人。对于一位家长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喜的呢?

张丽玲说,正是这些事让她觉得十分欣慰,即使是在《留》一片争议众多,风波起伏的时候,她的家人和朋友为此受了很大伤害,妹妹因此犯病住进医院,她也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后悔过。

我们挥手告别之前,我们在除夕的礼花声中迎来新的一年。我们是否可以多一点梦想,少一点欲望呢?是否可以多一点踏实,少一点浮躁呢?

张丽玲和她的《留》为我们讲述了一批追梦人的故事。看她片子的观众也许会开始思考人生。而思考或许会让中国人心中那个模糊的梦想逐渐清晰。

作为一个人,你难道没有梦想吗?哪怕是当一个花店的老板娘!

如果有梦,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梦呢? 文/方佳 摄/罗健